

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科研项目

1937年~1945年

中国文学爱国主义母题研究

苏光文
主编

重庆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科研项目

1937年~1945年

中国文学爱国主义母题研究

苏光文 主编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37 年~1945 年中国文学爱国主义母题研究 / 苏光文主编.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1

ISBN 7-5366-5457-X

I. 1. . . . II. 苏. . . . III. 爱国主义—题材—文学研究—中国—1937~1945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7876 号

1937 年~1945 年中国文学爱国主义母题研究

苏光文主编

责任编辑	陈兴芜
封面设计	吴庆渝
技术设计	聂丹英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华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1
字数 275 千 插页 4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ISBN 7-5366-5457-X/1 · 1057

定价: 19.00 元

目 录

引 论 爱国主义母题的历史语境·····	1
一、爱国主义及其言说·····	2
二、中国传统文学中爱国主义母题的多重内涵·····	9
三、1937年~1945年中国文学爱国主义母题表现概览·····	18
第一章 苦难：时代的诗意的歌吟·····	36
一、冻土上的灵魂诉说·····	37
二、小城里的生命沉思·····	58
三、阳光下的人性呼唤·····	74
第二章 孤愤：流亡途中的悲歌·····	88
一、流亡意识与流亡文学·····	89
二、孤儿意识与台湾抗日文学·····	112
第三章 解放：个性的民族的二重变奏·····	124
一、启蒙主义思潮的复苏·····	125
二、“原始强力，个性的积极解放”的历史抒写·····	135
三、个性解放与民族解放意识的高扬·····	152
第四章 批判：社会的文化的双向突进·····	180
一、《华威先生》引起的批判与自省意识新思潮·····	181
二、战争苦难描述中的人生反思·····	193

三、生活透视里的社会剖析·····	207
四、世俗勾勒里的文化批判·····	218
第五章 民族形式：爱国精神观照下的文艺理论指向·····	235
一、现实主义理论及创作的讨论·····	236
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论战·····	252
三、“民族形式”论争·····	270
第六章 承受与担当：在同一地平线上·····	281
一、交往与融合·····	282
二、爱国主义行为的共时性反映·····	295
三、人的尊严与价值的失落及复归·····	313
四、人性善与生命意志的张扬·····	328
结 语 省思与呼告·····	341
后 记·····	350

引论 爱国主义母题的历史语境

1937年~1945年中国文学中的爱国主义，集中于一点即文学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服务。那么，文学如何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服务呢？这是进入这一时段中国文学领域和考察、分析、把握其爱国主义母题的关键所在。

胡风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爆发后中国文学存在的状况，归纳出了文学为战争服务的两种表现方式与行为途径。其一，“通过正确地反映生活现实，反映人民大众底生活欲望和战斗意志这一条道路”去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服务。^①其二，“把文艺作用限定在使人民单纯地做战争‘工具’的鼓动宣传”式去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服务。^②同时，胡风把前者称为“全民性的爱国主义”，把后者称为“抽象的爱国主义”。进而，胡风要求“从抽象的爱国主义解放出来。通过人生苦恼和理想燃烧对于战争胜利和民族新生的渴求，这种带着全民性的爱国主义依然是历史要求底反映，因为它是通向人民底方向的；然而，只是简单地企图用抽象的民族气节动员人民参加战争，使

① 胡风：《民族战争与新文艺传统》，《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② 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评论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人民成为战争工具的那种‘爱国主义’，已经完全转化成了抹杀历史要求的反动的武器。这在文艺思想上就是虚伪的主观公式主义。”^①这里，胡风已经涉及到了爱国主义和文学创作中爱国主义繁富内涵的界定即广义的爱国主义与狭义的爱国主义范畴了。其实，爱国主义和文学创作中的爱国主义内涵、母题，始终是多样的丰富的而非单一的偏狭的。中国爱国主义积淀的存在状态、中国传统文学中爱国主义的表现形态以及1937年~1945年中国文学爱国主义母题，莫不如此。我们在研究与撰写本书过程中，自然倾向于“全民性的爱国主义”和认同于“全民性的爱国主义”，但对“抽象的爱国主义”作具体地深入地冷静地分析，而视其服务对象——战争的正义或邪恶等属性，予以取舍，加以褒贬或抑扬。我们倾向和认同的“全民性的爱国主义”，也是多层次的，多维度的。

一、爱国主义及其言说

爱是自从人类出现之后就有的—种情感，是人的本性之一。父母之爱、兄弟姐妹之爱、情侣之爱、祖宗之爱，都属于人的与生俱来的血缘与亲情之爱。也许，其中存在着不爱的事与人，然而那个血缘与亲情基因却是一个永恒的存在，始终无法抹去，也不能选择，不以人的爱与不爱为转移的。人类社会，历史悠久。就中国而言，从古至今，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经历着多个发展阶段和朝代更迭，但是这一与生俱来的血缘与亲情之爱，确实如一条永不干涸的河水流淌其间，联系着你与他、我与你、古与今乃至中与外。

① 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评论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那么，爱国主义同人的这一与生俱来的血缘与亲情之爱有何关联呢？

可以这么说：爱国主义是不同和相同的血缘与亲情之爱的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及不同历史条件下，逐渐积淀而成的一种共有的情感、意识、精神乃至行为方式。据此，似乎又可以说：爱国主义是血缘与亲情之爱的扩展和提升。也即是说：爱国主义是“家”之爱的扩展与提升。这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说的：“一切社会中，最古老而惟一自然的社会，就是家庭。”也如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所说的：“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中外古今的社会中，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大体亦然，“家国同构”，“家国同体”。《孟子·离娄》里说得十分明白：“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庭——社会——国家，便是这么一种分拆不开的关系。当然，爱国主义主要是人们后天拥有的，是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形成的。爱国主义是一种历史范畴，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中爱国主义有着千差万别的丰富形态。^①

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情感形态，主要表现为对人的爱，对“家园”的爱，对“祖国”的爱。这种爱带有泛爱的特性。爱人和爱“家园”，早在中国古代的禹之前就出现了。《礼记·礼运篇》描述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外

① 爱国主义这一概念及其完整内涵，中国现代史学界认为始于19世纪中后期而完成于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人民大革命阶段。

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里，描绘的是禹之前“大同世界”的和谐、呈祥景象，显然涂染上了较多的浪漫夸张色彩，然而字里行间却充溢着那时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以及人人对家园的钟爱。这一爱人与爱家园的情感，在千百年的历史演进中，成了中国人共有的情感基因，浸入了中国人的骨髓。中国人无论在何生存环境里，总是对自己的家园里的山水与草木怀有着眷恋之情，对家乡的人怀有着深厚的乡情。“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这一俗谚，便浓缩着这一深情厚意，表述着一种恋乡情结。“国家”出现以后，这一爱人与爱家园之爱，扩展而为对国家的爱与对人民的爱。《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民维邦本，本固邦宁。”便是说的“民”与“邦”的关系，爱民与爱邦的关系。《汉书·陆贾传》中有一段描述“中国”屹立于东方的情景：皇帝“继五帝三王之业，统天下，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此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作者虽然把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的营造归功于汉高帝刘邦的组织与领导，然而却也透露出其时中国人对这个统一国家的热爱之情。爱乡人与爱家园同爱国人与爱国家，融为一体了。因此，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情感形态，反映和标志着人与人、人与国家的一种人生态度与情感指向。

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表达了人们对所生活的国家的一种思想政治态度与行为方式。爱国主义进入意识形态，根据《礼记·礼运篇》的记述，大约是在禹之后开始的。《礼记·礼运篇》这样记述道：“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人大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仪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

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这就是说，禹之后，私有制度建立，血缘与亲情以及由此而扩展的属于情感范畴的爱，被一种公共的礼仪所取代。这种礼仪，规范着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的关系，且贯穿于制度的构建、疆界的划分、人才的选用、个人利益的谋取以及用兵打仗等等一切领域之中。在这里，“礼”、“礼仪”作为其时的社会规范与道德规范以及制度准则，就有了爱国主义意识这一基本含义。从西周到秦汉，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逐渐演变为儒家的一种政治思想意识，或者说儒家思想意识构成爱国主义意识的基本内涵。西周以前，“村”、“邦”、“邑”，实为氏族与部落的聚居地或诸侯领地。这种“村”、“邦”、“邑”，统称之谓的“国”，星罗棋布，有“国土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的说法。周武王之后，西周吞并了99个国家，降周的还有652个国家。生活于东周时期的孔子，创立儒家学说，“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崇尚“仁义”，提倡“忠恕”。《中庸》中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讲的就是人要有仁爱之心，要有人人相爱之情。这就适应了氏族制被家族制所取代的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就把血缘与亲情形成的一种内在情感与道德意识而提升为人际关系中的一种道德规范：人与人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应相互关心、相互热爱、相互尊重，“和为贵”。“忠恕”则进一步规范人与人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个人对国家“忠”，臣对君“忠”，人对人“恕”。孔子开办学校，招收学生，传播其以“仁义”和“忠恕”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学说，张扬“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的大旗。^①汉武帝，

① 《大学·第一章》。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主要统治思想。其间，凝结而成的“忠君报国”、“忠君爱国”、“精忠报国”信念，成为了一代又一代爱国志士仁人奉为圭臬的思想意识准则与行为方式标准。但是，以家族为单位构成的宗法社会国家，把血缘与亲情之爱推进到超血缘与亲情之爱的范畴，这就不能不使血缘与亲情之爱发生变异，出现“忠”与“孝”不能两全的分裂现象。这就使得相当一部分志士仁人常常舍“孝”而从“忠”。在漫长的宗法社会历史演进过程中，还出现了与“君本位”相并存而呈弱势的“民本位”爱国主义观念。这种“民本位”观念，似乎始于孟子，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①他还提出了“民本位”的忧乐观：“忧民之忧，乐民之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②这一观念得到了后世一代又一代的儒家志士仁人所认同且加以发挥，一直到黄宗羲喊出石破天惊的话语：“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作人臣者，“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由此，形成了以“民本位”为核心的另一种形态的爱国主义观念。在漫长的社会历史演进过程中，这两种爱国主义意识形态，始终存在着。这就使得作为政治思想意识的爱国主义，在不同阶级、阶层、集团那里，有了不同的具体内容。被统治阶级、阶层、集团的反抗斗争，无疑是爱国主义的一种构成成分；敞露统治阶级的黑暗与社会弊害，无疑也是爱国主义的又一种构成因素。反之，统治阶级为着维护其统治秩序和巩固其统治地位，也在爱国主义名义之下实施种种行为措施。因此，爱国主义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与阶级印记。

爱国主义作为一种精神，尤其是作为一种民族精神，便具有

① 孟子：《孟子·尽心下》。

② 孟子：《孟子·梁惠王下》。

了全民性与民族性，成为全民与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构成的整体。中华民族的形成是经过数千年的漫长历史过程的。远古时代，东方居住着“夷族”，北方居住着“狄族”，南方居住着“蛮族”，西北方居住着黄帝族。这些不同氏族或部落，在不断的相互冲突与争斗中，黄帝族终于获胜，强大起来，并融合其他一些氏族或部落定居中原，形成为华夏族。“居四方之内，天下之中”的“中国”华夏族，得天时地利之便，有了巨大发展。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族也就成为了战国、特别是秦汉以后多民族的统一中国的主体。以汉族为主，由多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就在数千年历史演进中而形成而生生不已。作为一种共有的精神支柱的民族精神，也就在这一求生存求发展的历史演进中积淀而成，且充分地体现了出来。无论朝代怎么更替，帝王怎么更换，民族间怎么斗争，中华民族而不散、中国而长存，乃至延续至今，走向未来，靠的就是这一最基本的内在的民族精神的支撑。那么，这一以贯之的民族精神是什么？自然，可以说出多种多样的具体内容。但是，其内核则是夏、商、周为源头的刚健有力、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吸收“夏易”与“商易”内容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源的《周易》，阐述的便是天地、宇宙、社会、人生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则与规律。《周易》开篇即是“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运行，周而复始，刚健有力；人求生存求发展，也如天体运行那样，坚韧不拔，自强不息。这一精神力量内化为一些至今仍具活力的故事传说，如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等等。我以为，这就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内核，这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张力得以生长的酵素。以这一内核构成的民族精神，便是

中华民族的“民族魂”，便是中国的“国魂”。中华民族，正是依赖于这一内在“民族魂”，才渡过了一次次劫难繁衍至今，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历史最为悠久的民族；中国这只航船，也正是依赖于这一内在的“国魂”，才在一次次狂风巨浪搏击中，不断驶向新的航程。

爱国主义，作为一种行为方式，集中体现为人或人们的一种行动。原始社会时期，爱氏族或爱部落主义，表现为为本氏族或部落的安全而抵御其他氏族或部落的侵犯的一种自卫行动；也表现为为本氏族或部落的生存与发展而掠夺其他氏族或部落的财物与人的一种侵犯行动。奴隶制社会以后，爱国主义表现为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及执政阶级的权力稳固的一种行动。如果，遭受异民族的侵扰，则表现为维护本国的安全与领土的完整的一种行动。这种行为，带有较大的指令性乃至强制性，因而也带有或多或少的盲目性，并非完全出于一种清醒的自觉意识与精神的支配。但是，在这里，爱国主义却成为人或人们的一种行为准则或道德规范。

1937年~1945年间，正值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际。中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根本任务就是打败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求得民族的解放。中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承受着空前的民族灾难，担当着民族解放和推进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艰巨使命。这场战争，也是中国自身改造和中华民族洗雪百年耻辱获得新生而作“世界市民”的契机。因此，中国广大军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被空前地激活了，爱国主义内涵也同时具有了前所未有的繁富形态。

1937年~1945年间，中国人的爱国主义，较之于中国人的传统爱国主义，无疑既有承传，更有发展与超越。刚健有力、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大智大勇精神，发扬得最为充分，

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忠君爱国”、“忠君报国”的传统爱国主义意识与行为，日渐为民族解放和国家的独立而战斗的意识与行为所代替，爱国主义由传统向现代开始了大转换；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消灭法西斯势力和维护世界和平、营造中国与世界各国能够共同发展的环境这一基本点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中国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又是融合在一起的，这又是爱国主义由传统向现代大转换的一个重要标志。

1937年～1945年间，中国大地被分割为多维空间，其中主要有抗日民主根据地、大后方、沦陷区、香港与台湾、澳门。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之所以能取得胜利，除了诸多外在的条件以外，最根本的内在因素则是这些不同地区的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人共有的这一爱国主义精神支柱。不同地区的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人，也正是得力于这一爱国主义的支撑，而渡过了那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劫难而开始获得新生，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尽了本民族应尽的责任。

二、中国传统文学中爱国主义母题的多重内涵

“文学是人学”，无论就传统还是现代意义上说，都是讲的“文学与人”的关系，自然其中是有较大差异性的。前者，似乎只讲了文学是人写的，写人的，写给人看的；后者则延伸为文学是人的存在形态，人的生活方式，人的构成要素，人是一种文学符号，文学是人的一种代码。有两千余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学，我认为，既有“文学是人学”的传统意义，也隐含有“文学是人学”的现代意义。爱国主义既然浸入中国人的骨髓而代代相传，并积淀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一种永不枯竭的意识流与行为方式，那么作为“人学”的中国传统文学来说，流

贯着爱国主义母题便是自然的了。

中国传统文学中的爱国主义，同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在于：一个属于思想意识的行为方式的范畴，一个属于审美范畴。联系在于：属于审美范畴的爱国主义文学母题则是由属于思想意识的行为方式的爱国主义“内化”或“转化”而来。这种“内化”或“转化”的“中介”自然是作家创作主体乃至读者主体。应当说，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文学基本常识。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文史哲一家”的说法。照我的理解，这一说法，应当包含这么几层意思：一是说作者集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于一身，二是说作品（著作）的内容有深刻的社会人生见解以及哲理寓意，三是说文本形式于文史哲的神形兼备。事实上，这一说法与理解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是既存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学的历史事实。从发生学这个角度上讲，中国传统文学就源于“史”与“哲”。氏族社会时期，黄帝族把掌管文化的人叫做史，而另一氏族苗黎族又把掌管文化的人叫做巫。“史重人事，长于征实；巫事鬼神，富于想象。”^①这就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史”与“巫”的不同职责及其思维方式。历史演进到周朝时，“史”的职责扩大，作品形式出现了。周朝的史官，掌管记事，也兼作诗歌。于是，风雅颂的诗歌形式出现了。同时，《周易》与《山海经》问世了。《周易》与《山海经》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也是中国传统文学的源头。这两部著作，堪称是典型的“文史哲一家”的作品（著作）。这两部作品（著作），浸透着的自然、社会、人生的发展变化的哲理内涵，是通过形象生动的描述传达出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来的。特别是《山海经》更是通过一系列故事传说与山川风物的描绘而体现出大智大勇与坚韧不拔的精神特质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寓言、故事、神话乃至小说诸种文学作品问世了。特别是老子的《道德经》与庄子的《庄子》以及孔子的《论语》,可以说既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又是盈溢形而下与形而上内涵的哲学著作。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创作出了不朽的《离骚》。秦汉时期,司马迁创作出了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记》。隋唐五代时期,韩愈写了《原道》、《原毁》,柳宗元写了《封建论》。宋朝,苏洵写了《六国论》,王安石写了《答司马谏议书》,苏轼写了《留侯论》等等。可见,秦汉之前,文史哲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且延绵于后。也就在这一不解之缘的缔结与延绵于后过程中,渗入了文人们的使命意识与社会良知,使作品(著作)干预了或参与了社会人生活活动。功能意识,进入了文学价值观念与审美意识的中心地带。中国传统文学,也就在一个漫长的稳定型结构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日渐凝固为稳定型的文学形态。一代代的中国文化人,既是中国文化的继承者与创造者,也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与阐释者。他们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一社会角色与身份地位,并不因为社会历史的变迁或生存条件的改变而弱化以致消失,似乎层层相袭,代代相依。形态各异的爱国主义,成为中国文化人一脉相传的思想意识与精神、行为。形态各异的爱国主义也内化或转化为了中国文学的一以贯之的中心话语之一。

人类社会是在多灾多难中从古代走到近现代的。仅就战争而言,据统计,从公元前2000年到近现代,共发生过大的战争就达2000多次。其中,有内战、暴动、国际战争、世界大战等等。中国是人类社会进程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之一,朝代的兴衰更替,几乎都是通过战争实现的。战争,自然有正义与邪恶之分;战

争，也自然有侵略与反侵略之别。尤其是邪恶的侵略的战争，对于广大民众（包括广大官兵）来说，是一种致命的灾难，因为它造成大量人的伤亡与物的毁坏，因为它摧残人情与扭曲人性。因此，战争也就成为有良知的一代代的文化人议论的话题，描写的重要题材。

纵观中国传统文学中描写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其爱国主义母题，大抵呈现出这么一些类型。

一是抗争与主宰意识型。这一形态的爱国主义，可以说贯穿中国传统文学的始与终。《山海经》中的《大荒北经》和《大荒东经》，也许是中国传统文学中反映战争的最古老的作品。“蚩尤作兵，伐黄帝。”胜利者是黄帝。作品称颂了黄帝的足智多谋，勇敢善战。这种内涵，应当说顺应了为后来事实证明了的历史发展潮流。因为黄帝得胜后而定居中原，形成华夏族，并由此相传而为唐尧、虞舜与夏、商、周的祖先。《诗经》中，《无衣》一诗，抒写了秦统一过程中，广大兵士的精神风貌与心理状态：“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由《左传》、《公羊传》与《谷梁传》合称为的《春秋三传》，描写了春秋时期大大小小的战役与战斗场面。流贯其中的多为抗争意识、主宰意识与称霸意识。集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于一身的曹操，他的一些诗篇，在那博大的胸怀与雄豪气势的张扬中，跃动着一颗图王谋霸的心：“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步出夏门行》）南宋名将岳飞的《满江红》词，凛然正义与威震山河的氛围，辉映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抗争意识与“精忠报国”